

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的起义与湖南乡村社会^{*1}

王继平

(湘潭大学历史系,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太平天国时期, 湖南各地相继发生了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和自发的会党与农民起义。这些起义和响应, 既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感召下发生的, 也是鸦片战争前后湖南社会状况的反映。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的起义呈现出阶段性, 反映了它与太平天国运动的密切关系。湖南各地的起义与响应, 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太平军的斗争, 也反映了湖南人民反抗压迫和暴政的正义精神。

【关键词】:太平天国; 湖南乡村社会; 起义

【中图分类号】:K254.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7)04—0151—07

太平天国时期, 太平军曾三次进入湖南: 1852年太平军进军南京时横扫湖南大部分地区; 1854年太平军西征进入湘北地区; 1859至1862年间, 石达开部太平军多次攻入湘南、湘东和湘西地区, 转战于湘桂、湘粤、湘黔边境。太平军进入湖南, 不仅直接打击了湖南地方封建势力, 也激发了湖南各地群众反封建的斗争。因此, 在太平天国时期, 湖南各地的响应和起义此起彼伏, 构成了19世纪50—60年代全国反封建斗争的浪潮。这一时期湖南激烈的反抗斗争与乡村社会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拟对这一时期湖南各地响应太平天国及在其影响下的起义与湖南乡村社会的关系做一探讨。^②

一

在太平天国运动酝酿和金田起义前后, 特别是太平军进军湖南时期, 湖南各地特别是湘南地区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会党活动和起事也较为活跃, 形成了湖南地区较具规模的会党和农民起义浪潮。

在鸦片战争之后, 湖南就发生了连绵不断的起义和反抗斗争, 影响较大的有:

1832年1月, 江华瑶民赵金龙发动的湘南瑶民起义。起义军队伍一度发展到3000余人。赵金龙起义震动了全国, 清廷先后

¹*收稿日期: 2017—02—21

作者简介:王继平(1957—), 男, 湖南双峰人, 湘潭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2BZS080)

² ①关于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的起义与响应, 学界在上世纪80年代有过关注, 如姜东光《湖南新宁李沅发起义述略》(《湖北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耿仕信《李沅发起义始末》(《求索》1981年第2期)、杨奕青《浏阳征义堂及其与太平军的关系》(《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关于赵金龙几个问题的商榷》(《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马冠五《论西征军入湘和湖南人民的抗清斗争》(《军事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西征军离湘后湖南境内人民抗清斗争述论》(《军事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论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主要研究的是几次大的起义, 或是某一时期的起义与响应, 缺乏对整个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地区农民起义的描述和它们之间关系的揭示以及与此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状况的联系。

令湖广总督卢坤、湖南提督罗思举督兵镇压，并令广西、广东两省官兵严守边界。清军先后出动兵力达万余人，围追堵截，直到1832年5月下旬，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836年武冈瑶民蓝正樽发动的起义。1834年，蓝正樽与童生陈仲潮、雷克绍等向地方政府提出“改庵为祠，以族化乡；鼓励勤耕，发展生产；广兴义塾，崇尚礼让”等建议。结果官府不但未予采纳，反而加以迫害，在这种情况下，蓝正樽便利用“斋教”作掩护，以斋教徒为基础，组织“龙华会”，向瑶民进行反清宣传，瑶民纷纷响应，入会者近4000人。1836年3月正式宣誓起义。蓝正樽自称“卫王”，建元“刚建”，颁布《王政十三条》，然后兵分三路，进攻武冈州城。知州诈降，义军直入时，伏兵四起，猝不及防，伤亡惨重，后又遭地方团练围攻，起义失败。蓝正樽父子逃往广西后继续从事天地会的反清斗争，其子后来加入了太平军。

1847年，乾州苗民石观保发动的抗租斗争。1844年，湘西连遭水、旱、虫灾，田地损毁，禾谷歉收。但地方官府依然催交屯租，乾州苗民石观保、杨正富等在无可奈何之中，只好诉之于官，要求减租。地方官员依旧不闻不问。1847年，湘西再度发生严重虫灾和水灾，毁田无数，收成锐减。秋收之后，官府再度追缴屯租。在这种情况下，石观保等决定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以乾州厅阳孟寨为中心，聚众数千，筑城建堡，积蓄弹药，制造刀矛，建立起义指挥部，一时从者如云。义军攻寨略地，斗争一直坚持到1849年年初。

1843年武冈曾如柱领导的抗粮斗争。1843年，湖南武冈发生自然灾害，境内粮食紧张，而当地地主杨居南等乘灾荒运米出境。曾如柱领导武岗聚集当地农民阻止，遭到知州徐光弼率兵镇压，于是曾如柱组织农民武装，于6月包围州衙，击毙徐光弼。7月，遭湖南巡抚、永州镇总兵英俊镇压，战败后牺牲。

1844年末阳杨大鹏发动的武装抗粮斗争。清道光年间，耒阳县官吏征收钱粮，以钱折银，肆意勒索。段拔萃代表农民抗议，被拘下狱，激起民愤，民众破狱将段救出。杨大鹏再次抗议，继任知县拒不受理，且将其弟扣押。于是他在1844年5月17日率农民千余人发动起义，围攻县城。后在清军的反扑下，杨大鹏战败被俘，在北京遇害。

1846至1854年宁远胡有禄发动的连续的武装起义。1846年9月，胡有禄与其兄胡有福、罗大纲在湖南宁远柏家坪聚众数千人起义，遭清军镇压失败。退回广西，又进攻阳朔失败，胡有福牺牲。1852年又与朱洪音在广西南宁起义，规模一度达三四万人。1854年8月，与朱洪音、何贱苟在广西恭城会合。9月10日，占据灌阳，建立“升平天国”，年号为“太平天德”，自称“定南王”。起义军曾进攻湖南道州，嘉禾、江华等地，并占领广西恭城、富川。

1847年新宁雷再浩领导的武装起义和李源发领导的武装起义。^{①3}

金田起义爆发后，湖南各地的响应层出不穷。

1851年1月，亲宁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即率众前往参加太平军，并一度进入了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主持策划军事。

1851年9月，宜章巧女王肖氏发动起义。先是，她与广东人杨得魁、刘上元等创立沙钵会，发展会众百余人，进行过一些反抗地主豪绅的斗争。到太平天国起义爆发时，王肖氏即集合会众，在宜章发动起义，攻打清兵关卡，后在清军的围攻下，王肖氏被捕牺牲，余部仍在湖南一带坚持斗争。

同年，桂阳县斋教徒朱幅隆等，也与广东会党首领李哑子等联络，密谋起事，聚众达七百余，但谋事不秘，被清兵捕杀。

衡州天地会首领朱九涛，以在江湖上卖药为名，广泛联系会众，准备起义，并自称“太平王”，设立秘密机关和旗帜、印信等，也因组织不严，被清军发现，起义流产，朱九涛潜逃。

³ ① 关于雷再浩和李沅发起义，已有较多论述，此不赘述。

郴州矿工刘代伟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即广泛发展天地会，准备起义响应，被清廷查获抓捕多人。1852年4月初，刘代伟发动会众劫狱，救出被捕人员，宣布起义，并与清军展开搏斗，未料遭到前来防堵太平军的湖广总督程矞采的镇压，起义也告失败。

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浏阳周国虞的“征义堂”起义和道州何贱苟的起义。

周国虞系天地会首领，早在1834年，他就组织了“征义堂”，广泛组织贫困农民，会众达二万之多。太平军进军湖南后，他曾与之相通消息，密报有关军情给萧朝贵，为太平军攻长沙提供了不少情况。当时，浏阳乡团尚未编齐，而清军正与太平军相持在长沙，故浏阳当局虽获知周国虞的动向也没有贸然行动。1852年10月，乡团编定以后，即开始围捕。周国虞率众反击，未能得手，曾准备全部投奔太平军，又担心其家被害，故退守家天坪、宝盖洞一带恃险守备。此时，太平军已出岳州赴武汉，湖南巡抚张亮基乃令江忠源回师浏阳，开始对付周国虞。

次年1月26日，周国虞在清军的攻势下，被迫宣布正式起义，宣称“官逼民反”。并出兵三千，兵分三路，直捣清营，杀毙不少清兵，但起义会众多当地农民，战阵不精，小胜后转至大败，退回古港一带。江忠源采取分化政策，颁布所谓良民免死牌，使周国虞起义军散去不少。接着，浏阳、平江团勇及千总李辅朝部也与江忠源部一道，围困起义军。义军在周国虞的率领下，虽进行反击，但最终被清军歼灭，周国虞本人也远逃他乡。

1853年的春季，道州何贱苟组织起义。何贱苟系天地会首领，他以常宁的五洞、桂阳的白水洞、道州的岩头村、宁远的癞子山为据点，“到处发币码，入会者约四五千”，他自称普南王，响应太平军起义，在同年4月宣布起义，并派出部队进攻道州城，击毙清军把总许德禄和典史吴世昌，后在曾国藩所派兵勇的镇压下，退出道州、宁远一带，坚持与清军作战。同年年底，何贱苟督师攻克常宁县城。嗣后，起义军又转战于蓝山、嘉禾、道州一带，并与广西天地会首领胡有禄军联合，进攻前来围剿的清军。次年1月初，双方激战于道州教头坪，何贱苟损失较大，以后退入广西境内，并继续活动于湘桂边境。

除以上两起较大的起义外，在太平军进军湖南途中，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不断发生。1853年1月，攸县谢友与广东江西的天地会众合作，攻打县城，4月，衡阳草市刘积厚、安化蓝田串子会分别发动起义，8月，广东乐昌天地会义军攻入宁远，10月，又有醴陵、茶陵的天地会众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规模都不大，先后被正驻扎在衡州编练湘军的曾国藩派岳镇压下去了。但是，这些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反动统治，构成了太平天国初期全国人民反封建斗争高潮的一部分。

二

鸦片战争特别是金田起义前后及太平军进军湖南期间，湖南会党和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这是与这一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湘南与广西北部毗连，乡村社会情景大致相同。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这一时期乡村社会的流动呈现出向下流动的趋势，从而造成社会贫富严重分化，下层社会民不聊生，社会结构失衡，社会矛盾激化。

造成湖南社会流动持续向下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土地兼并严重，地租与高利贷盘剥厉害，造成自耕农乃至中小地主破产，乡村经济凋敝。清初，由于战乱恢复，地旷人稀，自耕农为数较多。随着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趋势严重。在湖南，地主兼并土地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投效投献、倚势侵占、持强贱买等情况。《湘潭县志》曾记述该县地主投效投献的情况说：

“康熙初，土旷人稀，多占田，号标产。标产者，折竹木枝标识其处，认纳粮遂为永业。其时大乱，漕重役繁，弱者以田契送豪家，犹惧其不纳。”^[1]

所谓弱者，实际上就是那结在苛赋重税和天灾人祸之下濒临破产的农民，被迫将田契投献给地主，甘愿做佃户，以求其庇

护。这是封建社会比较常见的情形。

地主倚势侵占或强买土地的情况在湖南也不少见。当时有记述说：

“邑之细民，置田产，惧差役之累，立券书诡寄绅士门下……年远，豪强者遂夺其田，佃民多愚弱，不敢校。”^{[2] 1}

有的豪强地主倚仗官场势力，强买百姓土地。嘉庆年间，长沙李象鹄最初有田收租六百余石，“服官中州后，禄入较丰”，“置产数倍于前”至道光年间，已较最初多至六七倍。^[3]

地主兼并，造成土地集中，“强者佞渔僭窃，田连阡陌；而弱者拱手他人，身无立锥”。^{[4] 22}占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比比皆是，桂阳县的邓仁心、邓仁恩兄弟，有“田数百顷”，“以富雄一方，至用担石乘田契；乘马不牧，游食田野数十里，不犯人禾”。^{[5] 25}衡阳县的刘重伟，为万金之家，其子孙在嘉庆时，“田至万亩”。^{[6] 5}道光年间常德的丁炳鲲，其田也在四万亩之上。^[7]土地兼并的后果，便是大量自耕农丧失土地，沦为佃户。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缴纳的地租额是很高的。鸦片战争前湖南的地租形态是以实物地租为主。在嘉庆朝刑部案件关于地租的诉讼案中，湖南的9桩案件，实物地租占6件，货币地租仅3件。^{[8] 70}

实物地租租额一般较高。在“地薄田脊”的浏阳县，“丰年之收，每亩不上一石七八，纳租不过五六斗”，约占收成的30%—35%。^{[9] 28}而岳阳一带的地租，“主佃各得其半”，租额达50%。^{[10] 20}根据乾隆嘉庆朝刑部藏档的统计，当时湖南各地的租额一般在每亩0.5—1.0石以上，按当时亩产水平，地租率一般在50%上下。有的则超过此数，高出甚至多。湘乡王殿玉佃田四亩，年纳租十石，亩平2.5石；酃县刘必学佃山场四亩，年纳租八石，亩平2石。这个租额已远远超过了50%。^{[8] 70}

农民在承受苛重租税的同时，还要忍受地主阶级超经济的剥削与人身迫害，有人记载长沙县地主对佃户的超经济强制的情形时说：

“从来雇工佃户，原为力役之人，非同臧获可比。近见湖南人情浅薄，以强欺弱，往往有本属雇工，配以婢女，限满不许归宗，行羁留者。偶或挈妇言归，辄即指为逃奴叛仆，辄展兴诉，愚民饮恨吞声，莫敢辩理，殊堪矜怜。又有擅将佃户为仆，恣行役使，过索租粒，盘算磊利，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佃户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户死亡，欺其本宗无人，遂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者。”^{[11] 21}

此外，农村高利贷也是农民所承受的封建剥削之一。高利贷利息非常之高，如岳阳乡村，贷谷“石息三斗，春夏贷而秋收”。^{[12] 3}龙山县借贷制钱三千文，每钱一千每年还苞谷五斗为利^{[8] 91}，在长沙，高利贷者实行所谓“加三”，即以月计息，“有一、二日零期者，亦算一月扣利”，且放贷时每两银成色不过九四、九五，“每两必轻三分、二分；进银则要十分足以，每两必重科三分、二分”，“名虽加三，实则加四、加五，牟利剥民”。^{[11] 35}如此苛重的利息，往往使借贷者倾家荡产，不足以偿还利滚利的高利贷。

湖南农村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农民租额的沉重，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极其困苦。“力田所入，抵债去其大半”，以至“甫交冬春，即须余米而食”^{[13] 7}，长沙一带的农民，“佃耕多于自耕”，而“佃耕农民，多形拮据”，“终多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14]在这种情况下，农村贫富对立十分严重，自耕农大都逐渐变为佃户，土地相对集中于大地主手中，所谓“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田之归于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13] 8}

二是商道的改变，导致大量船夫、车夫、脚力乃至商道上的餐饮、住宿业者失业。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闭关政策，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内地的土货出口，西方的洋货进口，都是在广州进行的。这样，在广州和内地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商道，湖南正处在这条商道的中间。这就使湖南出现了一批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城市，例如湘潭，就是这样的重要转口贸

易城市。有记载描述湘潭的情形：

湘潭亦中国内地商埠之巨者，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因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东放洋，以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15] 46}

这是因为当时水运是主要交通工具，湘潭居湘江之滨，拥有比长沙更适于水运的港口资源。再如洪江，虽是一个不大的城镇，但由于它地处湘黔边境，是连接广州、湘潭和黔、川之间经济往来的重要中转，故洪江也集中了不少转运商人，远至四川、贵州、近如湘西南，各种从事土货出口贩运或洋货转卖的商人，不少集中在湘西洪江镇。

当时“交通皆以陆”或水运，因此在广州通往内地的商道上，出现了众多以运输为业的手工业工人或雇工：

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南风岭地处湘潭与广州中央，为往来必经之孔道。道旁居民，咸藉肩挑背负以为生。^{[15] 46}

这里所说的是湘南南岭一带的搬运工人的情形。实际上，从湘潭至郴州、永州乃至湘桂边界，还活跃着相当数量的船工，也是以转运洋、土地货为生，他们或由湘南启航，沿湘江航行至湘潭，或径出湘江入洞庭，进入长江，往返于各工商城镇。

鸦片战争后，由于五口通商的开放，广州作为中外贸易的中心地位逐渐遭到削弱，代之而起的是上海。据统计，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后，进出口贸易历年上升，1853 年以后，就全面超过了广州，从上海进口的英国货物占全国进口英货总值的 59.7%，出口英国的货物占全国出口英国货物总值的 52.5%。^[16] 广州的地位已明显地下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重心已由广州转向了东南江浙地区了。这一现象对湖南乡村社会经济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首先是一些以中转进口贸易而兴起的工商城市在战后出现了萎缩和萧条的状况。前而曾经提到的湘潭，就属此类。在 4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初，由于五口通商，“外洋机械输入，复经国际战争及通商立约等事”，湘潭的情形“为之一变”。^{[15] 46} 以往的繁荣，尤其是进出口贸易的转运受到打击。其次，在岭南地区商道一带，以运输进出口货物为生的船工、脚夫等手工业工人也受到进出口商道改变的影响。战后途经此地的货物明显减少，已经不能容纳众多的运输人力，于是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破产，或成为流民，或转向其他行业，对湖南乡村社会的秩序有着深刻的影响，加剧了社会矛盾。

土地兼并和商道改变，使得大批农民及手工业者破产，沦为游民，或者成为会党。尤其在湘南地区，由于此地多山少地，强宗大户稀少，作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沟通官民、管理和调节乡村社会矛盾的宗族和乡绅势力软弱。有研究者指出，在湘南地区即使是地主乡绅，也并非强势阶层，道州“膏富之家积谷不过千石，岁荒则先闭泉，米价顿昂”；^[17] 安仁“士多守己自重，……大率皆清贫，以舌耕自给”；^[18] 零陵“士风读书自爱，逊让有余，进取不足”^[19]；“殷实之家，迳迳自守，淡于仕途，鲜纳粟为官之人”。^[17] 因此，官府在管理乡村社会时，缺乏强势的乡绅阶层为其支撑，于乡村社会纠纷的调解、诉讼的平息、是非曲直的解决往往是束手无策。所以，非常有利于流民、会党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20] 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湘南地区会党和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乃是与这一时期湘南地区的乡村社会状况紧密相关的，乡村社会流动的向下趋势、乡村社会阶乡绅层的缺失，导致会党与乡村下层社会的勾连，为反抗乡村的不平等和官府的苛政提供了组织形式和动员机制。

三

太平军北上离开湖南以后，湖南各地的会党活动和农民起义陷于了暂时的沉寂阶段。直到 1854 年，当太平军西征部队进入湖南以后，湖南各地起义又重新活跃起来，形成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响应起义的再一次热潮。诚如当时巡抚骆秉章奏称的那样，湖南“匪盗蜂起，莠民从乱如归，蔓延日广”，以至“处处有贼，每股多者如千，或万余，少者亦有千数百计，而皆以援江南大股逆贼为名，红衣黄巾，效贼装束，同时并起，势甚披猖”。^[21] 但是，这些起义和会党活动主要是在湘鄂、湘黔，特别是在湘桂、湘粤边境地区发动的。大多数是邻省会党，以邻省为后方，旋进旋退。湘中地区则陷于沉寂状态，与太平军西征作战

的斗争并不相呼应。

在湘桂、湘粤边境，主要是两广会党义军攻入湖南，与湖南会众共同联合作战，其区域主要在湘南地区。如广东仁化天地会入湘攻桂阳；连州天地会攻临武，乐昌天地会攻宜章、嘉禾、蓝山；贵州铜仁徐廷杰义军攻晃州、麻阳等地；黎平苗族义军攻通道等等。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东安天地会首领朱洪英与广西胡有禄联合起义的部队。

1854年，朱洪英与胡有禄在广西灌阳建立了农民政权——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与太平军建立了联系。是年11月，朱、胡出兵攻入湘南，进占道州，先后打败游击骆元太，苏元林的部队，后在王鑫部的反攻下，转战永明、零陵、江华、守远，最后退入广东境内。

1855年5月，朱洪英、胡有禄、何贱苟再次攻入湖南。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道州，零陵攻东安，一路则入道州境内。5月31日，义军攻克东安县城，据城抗击王鑫部，并分兵进攻新宁。在东安，义军坚守了三个多月，多次打败攻城敌人，直到9月中旬，义军在敌人愈来愈多的增援的情况下，才突围走全州。不久又折回东安，与王鑫部发生激战，义军损失严重，胡有禄被捕，何贱苟殉难，朱洪英率余部退回广西灌阳。

1855年11月，朱洪英联合孔亚福等义军，再次攻入湖南，占领永明，与清军苦战两月，最后退走江华，与焦三、许月桂部义军会合后，又继续与清军转战，不幸兵败，焦三、许月桂被捕杀，朱洪英即率余部走广东连州坚持斗争。至此，两广天地会与湖南天地会的共同反清起义，复陷沉寂。

在湘南天地会起义失败不久，澧州农民陈正卯、陈庭杰也发动了“穷团”（忠义团）起义，在湘鄂边区的澧州、公安、石门等地与清军作战。

自太平军西征部队离湘以后，湖南的反清斗争处于相对的平静时期。但在19世纪60年代伴随着贵州少数民族的大起义，湖南的反清斗争又有所复燃。

1866年6月，贵州苗军打破湘军李元度对义军的围攻，由天柱向湘西进军，先后转战麻阳、沅州、晃州、黔阳、会同、靖州、镇筵（凤凰）等地，与清军展开游击战。

1868年2月，贵州苗民义军在湘军席宝田、李元度的围剿下，损失惨重。为打开局面，张秀眉率领部分苗军再次进入湘西，先后在沅州、麻阳等地与清军作战，前后达三个月。

除贵州苗民的起义外，在湘中地区，则发生了哥老会的起事。1867年5月，湘乡会党曾广八率领会众六百余人发动起义，与清军发生激战。1870年3月，湘乡哥老会总堂赖荣甫等再次发动起义；同年9月，湘潭朱亭地方哥老会发动起义，转战于株洲、攸县、衡山及湘乡，造成一定的声势；1871年5月，龙阳（今汉寿）、益阳会党首领刘道美组织哥老会发动起义，先后攻克龙阳、益阳二县城，震动朝野。

但是，与太平天国金田起义前夕和太平军进军湖南的时期相比，这一时期湖南的会党活动和农民反抗斗争和起义无论其发生频率还是斗争规模都相对低小，而这种状况的出现，也是与这一时期湖南乡村社会的状况密切相关。

太平军北上离开湖南后，湘军崛起，为保障湘军后方基地的安全，湖南地方当局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首先是对会党和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曾国藩奉旨督办湖南团练之后，一面加紧督练湘军，一面在长沙成立“审案局”，对湖南各地的会党、农民起义进行残酷的镇压。咸丰二年（1852）冬，江忠源镇压浏阳周国虞征义堂起义；咸丰三年（1853）正月，

骆秉章、曾国藩派张荣祖前往攸县镇压洪利父子的暴动；二月，派刘长佑、王鑫等镇压常宁农民反抗；派张荣祖至宜章、桂东、临武镇压会党；派刘长佑、王鑫镇压衡山农民反抗；三月，派张荣祖等镇压永兴、安仁等地的反抗斗争；四月，派朱孙诒镇压安化串子会起事；四月至六月，派张荣祖、王鑫等镇压进入桂东、永兴的江西义军；四月至六月，派兵至永明、江华、蓝山、临武、零陵镇压进入湖南的广西义军；派罗泽南等镇压酃县、衡山的农民暴动；七月，派王鑫等镇压进入兴宁的广东义军；九月，派塔齐布等镇压由江西进入茶陵、安仁的义军；十月至十一月，镇压道州何贱苟领导的天地会起义。^①在镇压过程中，曾国藩主张用“重典”，对会党和起义农民进行残酷掠夺。据统计，仅安化蓝田一案，俘虏 132 人中，陆续斩决 67 人，狱毙者 36 人。^{[22] 94}而曾国藩的审案局，在其存在的 4 个月里，立予正法 104 名，立毙杖下 2 名，狱毙 31 名，总计 137 名，还不包括各县处死和后来捕捉的串子会 92 名。在武力的高压下，各地会党、农民起义相继被扑灭，曾国藩也获得了“曾剃头”的名声。

其次，是在镇压的过程中，兴办团练、推行保甲法，恢复和重建乡村社会秩序，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团练是中国封建社会乡村中较为普遍的民间自卫组织，往往由官府倡导、督促，民间筹措经费举办，一般为乡村宗族、乡绅所控制。清代的团练始于嘉庆年间镇压白莲教起义，湖南举办团练较早的是新宁县，主事者为江忠源，时在 1844 年。新宁团练在镇压雷再浩、李沅发起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军北上湖南时，江忠源率新宁团练在蓑衣渡设伏，予太平军以极大损失。曾国藩就任督办湖南团练大臣以后，除着力创建湘军之外，加紧在湖南各地兴办团练、建立保甲制度。在晚清湖南，团练与保甲制度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团练建立在保甲制度的基础之上，按保甲摊派保丁（团丁），组成团练，保甲与团练互为表里。曾国藩说：“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23] 127-128}“乡团之法，鄙意重在团，不重在练。专意以固结人心，搜查土匪为事。”^{[23] 126}“乡村宜团而不宜练”。^{[23] 123}根据曾国藩的这一指导思想，湖南巡抚骆秉章在全省大力推行保甲、团练制度，省城长沙设团防总局，巡抚主其事，府、州、县设分局，知府、知州、知县主其事，以下设大团、团，各保设团数目不一，分设团长（保）、团正、团佐（团）主其事。因此，湖南各地团练、保甲推行颇有成效：

道州：“城乡有团各有练长，练长由百姓报充，由来旧矣。一姓举报一人，或数人，多寡视族之大小，故一乡有多至十数人，少则六七人不等。察其行事之公私与稽查之勤惰分别奖惩。设立总簿，于每月朔赴州应点。所发门牌各注年貌户口及作何生理，每户悬牌一面，十家设一牌长，严连坐之法，互相稽查，十乡之内联之如一家，仍令练长按户查验，遇有停留面生之人许即送州究办。”^[17]

长沙：“乡团皆遵示办理，或一甲一团，或数甲一团，各地相地势适中之处设立总局，自团总以下次有团长、团佐、什长诸名目……六十以下十五以上，无论贫富贵贱，一律出丁，不得推诿。”^[11]

湘乡：“团练之法，无论地之广狭，人之多寡，或十余家一团，或数十家一团，或百余家数百家一团，又合一族一团，合数族一团，小团、大团总相联属……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为壮丁。……团练之法与保甲之法相辅而行。”^[24]

安化：“十六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无论绅士之家，有无田卒，均列名充当，外来留棍及素不认识者，不得冒充。”^[25]

蓝山：“邑四境俱以立团，大姓自为一团，零户数村一团，山民僻远数十家一团，俱以营伍部署之。城内商民别为一团，凡丁壮年十八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家各一人或数人。分南团、西团、东一团、东二团、北一团、北二团，是名六团……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26]

新化：“清同治元年，以练团御匪，分全县为十六团，九都八村，外加十五都五村、八都一村及石马三斗一村，共十五村，为大同团。大同团居县治之东岸，广六七十里，长一百二十里。”^[27]

⁴ ① 据易孟醇著《曾国藩传》第 83—84 页条列。

巴陵:团分合团附团,“团有合团、有附团。附团者独立不能成团,附就近之大团以资捍卫。”^[10]

由于湖南当局的严厉推行,各地团练和保甲办理卓有成效,被太平军扫荡的湖南乡村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和重建。保甲实行的连坐、联保制度,团练的昼夜防护,对会党和农民的起事、起义带来严重困难,而团练与清军的严厉镇压,也使会党活动与农民起义在萌芽状态得以消弭,这就是太平军在离湘东进江浙以后湖南地区的反封建斗争旋起旋灭甚至处于沉寂状态的根本原因。

因此,太平天国时期湖南各地的会党与农民起义与湖南乡村社会有着直接的关系。鸦片战争之后10年间,湖南乡村社会流动持续向下的趋势乃至停滞,下层社会身份的固化,导致乡村社会矛盾激化,从而酝酿了无数的抗捐、抗税、抗粮的斗争乃至揭竿而起的起义,演绎着会党和流民这种具有消极因素的反复起事。这种情况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呼应,便造成太平天国时期湖南持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当太平军离湘以后,湖南当局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治理,重建了乡村社会秩序,所以会党与农民起义也就相对被消解。

参考文献:

- [1] 王闳运等.湘潭县志[M].卷十一.
- [2] 邱琮.山阴邱氏文献私记[M].卷十一.
- [3] 李象鹄.棣怀堂随笔[M].卷首.
- [4] 皇朝经世文编[M].卷23.
- [5] 王闳运等.桂阳直隶州志[M].卷20.
- [6] 彭玉麟.衡阳县志[M].卷11.
- [7] 京报[M].第8册.
- [8]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M].卷1.
- [9] 邹俊杰等.浏阳县志[M].卷6.
- [10] 杜贵墀等.巴陵县志[M].卷14.
- [11] 张延珂等.长沙县志[M].卷20.
- [12] 杜贵墀等.巴陵县志[M].卷15.
- [13] 皇朝经世文编[M].卷39.
- [14] 张先抡等.善化县志[M].卷16.

-
- [15] 容闳. 西学东渐记 [M].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 [16] 黄苇. 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 [M]. 第 141—142 页, 附表 4—5.
- [17] 光绪. 道州志 [M]. 卷三, “赋役”; 卷十, “风土、风俗”.
- [18] 同治. 安仁志 [M]. 卷四, “风土志”.
- [19] 同治. 零陵县志 [M]. 卷五, “学校、风俗”.
- [20] 彭先国. 湖南近代秘密社会研究 [M]. 岳麓书社, 2001.
- [21] 骆秉章. 骆文忠公奏稿 [M]. 卷 2.
- [22] 曾国藩全集 [M]. 第 1 册, 奏稿, 岳麓书社, 2012.
- [23] 曾国藩全集 [M]. 第 22 册, 岳麓书社, 2012.
- [24] 同治湘乡县志 [M]. 卷 15.
- [25] 同治安化县志 [M]. 卷 16.
- [26] 民国蓝山县志 [M]. 卷 5.
- [27] 新化. 长塘李氏家史 [M]. 卷 2.